

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

段从学◎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诗文本细读 十三章

段从学◎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既不同于坊间流行的赏析，又有别于以英美新批评为标榜的细读之作的研究型教材。全书从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精心选择郭沫若、戴望舒、穆旦、翟永明、张枣、臧棣等诗人的十三首（部）作品，邀请国内实力派中青年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读。全书打破通行文学史教材的思维惯性，把文本细读当作独立的研究方法，敞开了一条以中国现代新诗为本体的细读空间。书中案例广泛而恰当，论述精彩深入，文字表述富有个性，是国内外第一部以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为读者对象的研究型教材，也适合专业研究者、新诗作者等使用和阅读。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 / 段从学主编.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302-47815-7

I. ①新… II. ①段…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8954号

责任编辑：张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3.75 字 数：246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产品编号：070990-01

作为独立研究的新诗文本细读

在目前通行的文学教育机制里，文本细读通常被认为是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按照这样的理解，文本细读首先被安置在文学史框架之内，变成了一种以文学经典为阅读对象，反过来又服务于文学史教学的入门行为。之所以普遍存在不满，也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生满足于识记和背诵现成的文学史结论，忽视了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欣赏，缺乏必要的文本细读习惯和能力。进而，在所谓人文通识教育这个更加大而无当的框架里，把文本细读理解为以缺乏基本专业背景的“外行”为对象，旨在养成必要的文学趣味和共同的社会文化感觉的基础性工作。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把细读当作一种服务并服从于更高一级目标的初级活动，最终通向某个巨大而稳定的结构体系，消失在普遍的社会常识和文化共同感里。文本细读被安排在文学史教学之前，就是这种理解的制度化体现。从具体的个别对象出发以认识最终的普遍之物的现代性认识论机制，则为之提供了更为隐蔽的合法性资源。

这样的理解及其相应的制度设计，当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乃至无可置疑的必要性。但问题也很明显，文本细读与纯粹出于爱好而“不求甚解”的作品欣赏，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形式的中国现代新诗，是否和其他文类一样，适合用同样的方法和规则来进行细读？所谓的“新诗文本细读”，至少必须考虑并尝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

基于此，我们首先的设计是颠倒文学史和文本细读之间的教学顺序。《新诗文本细读十三章》虽然顶着“教材”之名，但我们心目中的读者，乃

是掌握了基本文学史常识和必要历史背景而又不满足于此，试图更进一步对中国现代新诗展开专业性阅读的研究型读者。如果一定要落到实处的话，就是文学素养较好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我们始终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吧细读和通常的作品赏析区别开来，把文本细读当作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彰显并强化它打破文学史常识和僵化的文化共同感的能力。

为此，我们行文上不刻意追求普通教材体的通俗易懂。内容上，也尽可能避开常识性的叙述和介绍，把论述集中在作品上，通过具体的作品导出问题，理解问题。选取的篇目，也有相当一部分越出了通行文学史知识体系的藩篱。讨论的对象很具体，带出的问题却相当开阔，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每章末尾的拓展阅读和思考题设计，旨在为相关问题提供必要的线索，引发更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甚至隐含着反过来与此前的细读形成辩驳性对话的可能。有心的读者，相信不难从提出的问题和阅读线索中发现值得进一步展开的问题。

细读之所以被默认为一种服务并服从于文学史教学或文化共同感之养成的基础行为，与从具体的个别对象入手以认识普遍之物的现代性认识论机制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这种通过比较、分析和归纳具体的个别对象以获得总体知识的认识论机制，包含着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我们事先就已经知道了最终将要揭示出来的总体知识。凭借着这种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的总体知识，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细读的对象乃是“新诗”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才能通过对具体“新诗文本”的细读而比较、分析和归纳出“新诗”的总体历史特征。在这个所谓经由个别对象以抵达总体特征的认知过程中，个别对象是我们根据总体特征挑选出来的“个别对象”，总体特征则是我们接触个别对象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总体特征”。也就是说，最终被分析和归纳出来的“总体特征”，不过是我们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的“总体特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忽视，甚至假装根本不知道“总体特征”为何物，以便把事先藏在终点的“总体特征”当作陌生的未知对象抓取出来，营造从大量具体的个别对象中归纳出此前一无所知的“总体特征”的认知幻象。通行的文本细读教学，在这个意义上恰好可以看作是这个认知幻象的隐喻：早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思路和结论之所在的教师，仍然要从所谓直观的文学感受开始，引领着学生抵达那最终的思路和结论，竭尽全力营造获得了新知识的认知幻象。

我们的“新诗文本细读”当然不是直接针对上述认知幻象而发，更不可能对目前的教学制度设计有什么奢望。我们第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在与文学史的关系环节上，强调文本细读的独立性，挖掘其发现并解决问题的

研究能力，形成文本细读与文学史常识之间的对话，以此打破常识的封闭性。我们的问题，事实上往往相当宏大。关于《天狗》的细读，以医学“解剖室”为中介，巧妙而精细地把狂躁不安的身体和冷静客观的科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实际上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浪漫主义的情感神话、尼采—福柯式的后现代主义身体神话提出挑战，暗中动摇了人文理性对抗工具理性、诗学对抗科学等一系列现代性二元对立话语的权威性。关于《雨巷》的细读，同样不仅仅是在通行的结论和印象之外简单地提出一个新的说法，而是由此提出了现代性欲望生产机制的普遍性问题。

我们当然知道阐释学循环，也了解现代语言哲学对归纳和演绎两大传统认知范式的批判。我们的目标并非简单地颠倒通行的文本细读与文学史等级关系，而是要营造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此维系一种始终在问题之中，始终需要阅读和思考的状态。我们追求的是思想的可能性，而非结论的正确性。所以很自然地，面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以平实通达的眼光，循着体贴入微的人之常情，又对貌似深刻的新奇之论提出了质疑，恢复此前通行的看法。只要我们始终行走在阅读和思考的路上，类似的颠倒或修正也就不可能终结，化为常识的封闭性结构。而常识，也会反过来成为阅读和思考的出发点，成为思想的源头活水，而非僵死的归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随时随地把个人的经验和情感融入我们的阅读，转化为思想的动力。我们的阅读和思考也才会成为“我们的”阅读和思考。

在改写通行的文学史结论，丰富和扩展文学史版图这个默认的位置上，我们也尽可能尝试着将论域限定在具体的文本上，通过细密而深入的阅读以发掘问题、解决问题。堂皇点说，就是想以具体、扎实的文本细读，把相关问题落实得更精确、更有力量一些。这方面的例子，是对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和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的细读。前者把史料考订和理论思考结合起来，通过对“写作过程”的细致梳理，揭示了“诗性正义”与“历史正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从人类学的角度把力扬的“写作”引向了更为开阔的思考空间。后者依托于具体的文本，提出了当代“红色诗歌”这个值得重视的特殊现象，并将其放置在具有普遍性的现代性思想谱系和当代中国的复杂现实两大语境中，深入论析了“红色诗歌”修辞策略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了在更为宏大的思想和历史脉络中来理解“红色诗歌”及其现实诉求的可能性。

这意味着我们的“文本细读”绝不是将文本与历史割裂开来的封闭性阅读。所谓的“细读”固然包含着把阅读对象从其周遭的芜杂语境中呈现出来，成为特征鲜明的独立对象的意思。但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深入

文本，清理文本自身潜含着的历史文化元素，揭示文本与其周遭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文本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但不是归宿，更不是拒绝历史、拒绝现实的借口。比如说，我们之所以选取何其芳的《古城》，本身就包含着修订诗人文学史形象的意思。但这种修订却又自始至终围绕着具体文本，通过清理和重构具体文本周围的历史文化氛围的方式展开。对臧棣《菠菜》的细读，实际上回答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日常化”究竟为何物的问题，成了富有成效的当代批评。“细读”，在这里变成了深入发掘文本的复杂内涵，揭示其多重可能的实践，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细读”。循着文本自身的肌理和结构，只要能够在文本自身范围内找到立足点或根据，“细读”可以是别具一格的文学史研究，也可以是独立的批评实践。

现代文学的基本动力乃是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它拒绝一切形式的限制，把新颖和独创本身奉为自身的最高目标。它唯一的限制，就是自身探索的欲望和讲述的能力。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一种观点却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诱惑力：文学研究必须是“文学的”，且保持在“文学自身”范围内。这种要求和学科合法性问题发生关联后，逐渐演化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性。某某人的研究是“非文学的”，某某研究超出了“文学自身”的范围，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就成了善意的提醒或含蓄的指责。

且不说“文学”乃是一种现代性话语机制的理论问题，也不谈诸如弗洛伊德对古典作品的解读、拉康关于《被窃之信》的讨论、海德格尔对里尔克和荷尔德林等德语诗人的阐释之类的事实。但至少，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文学的任务是探索一切和讲述一切，我们的研究何以要画地为牢、自设藩篱呢？很显然，“文学的”或“文学自身”之类的说法，其准确含义应该是：只有立足于“文学自身”，以“文学的”方式面对相关问题才更为切实，更为有效。也就是说，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探讨相关问题，而不是必须或只能以何种方式探讨相关问题。主语和重心都集中在问题上，而不是问题的探讨者，更不是探讨问题的方式。把主语和重心置换成人，把“如何”置换为“必须”，显然误解了问题的真实含义。

就此而言，如同对待文本的态度一样，通常所说的“文学自身”同样也只是探讨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不是归宿。我们的“文本细读”，因此并没有局限在约定俗成的“文学的”范围之内。不是说要有意识和“文学的”方式拉开距离，而是说我们的阅读和分析自然而然地循着文本自身的踪迹和步伐，可能跨入哲学的领地，也可能涉及社会学的结构分析，甚至可能是什么学也不是的无名境域。我们和新批评的内在关联，实际上也

就在这里：细读不是借助现成的知识框架或机械的空间划分，在一个文本和另一个文本和文本的关联中展开，而必须是在我们自己和本文本直接的肉身性关联中展开。至于这种关联会引领我们抵达何处，以什么样的方式抵达等，则完全取决于文本自身的踪迹和步伐，而不是我们的社会位置。唯一的限制，就是我们探讨问题的愿望和能力。

长期依附或跟随某个庞然大物，习惯了借用文学之外的理论资源的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这样一种可能：文本细读乃是一种独立的实践，文学研究也可以成为其他学科灵感，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思想资源。所以，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和翟永明《乡村茶馆》等诗的解读，都很自然地逾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自身”的藩篱，带上了哲学的和思想史的意味。不敢说这样的“文本细读”就一定摆脱了对其他学科理论资源的依附，一定能够带来新的启迪，但至少，我们有了这样做的愿望，而且开始了努力。

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我们细读的对象乃是“新诗文本”。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体裁，而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有“新诗”之名，但却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新诗之实。胡适之追赠白话诗为新诗的源头，不过是倒果为因，以“新诗”的眼光发明了“新诗”，自己和自己玩合法性游戏的障眼法而已。外国文学史上，除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外，也没有中国现代新诗这样形式不固定的家族伙伴。问题是：惠特曼乃美国文学史上的例外。按照通行的文体学标准，“自由”和“诗”天生就不搭界。新诗至今仍或明或暗遭受着合法性问题困扰的原因，就在这里。换个角度，新诗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和历史活力，同样在这里。

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建立在“神意”或者“天道”的基础上。而现代社会，则是自己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同时又不不断质疑这种合法性，以此将自身保持在不断变革的历史道路上。中国现代新诗的历史境遇就是这种现代性话语最鲜明也最尖锐的表征。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新诗一方面要在数量庞大的“文学家族”中，借助包括文体学在内的多种知识和制度以谋求合法性，将自身建构为“被承认的文学”。与此同时，又要对自身的存在保持必要的反思和质疑，在不同的语境中激活相应的历史能力，将自身展现为开放性的话语实践。每隔一段时间，关于新诗的方向或道路问题，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重新提出来，就是这个原因。

但争论的结果并没有阻碍新诗之为“被承认的文学”，而是更多地激活了新诗对自身的反思，促成了新诗写作实践的自觉化。用时髦的行话来说，就是反思现代性的话语实践，也被吸纳和转化成了现代性。20世纪90年代

之后，这种对自身，甚至对语言、对写作行为的反省，实际上已经成了新诗最明显的本体话语实践之一。

本书的最后两章，即关于张枣的《镜中》和陈东东《全装修》两首诗的细读，在很大程度上呼应的就是这个问题。这里的切入点，仍然是文体学意义上的文本，但处理的问题却已经演化成作者的主体位置、语言与诗、新诗的文化位置与历史可能等复杂问题，刷新了通行的细读和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不是超出了文本自身的范围。恰恰相反，乃是更准确、更贴切地面对新诗，进入了“新诗自身”——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的“新诗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定要说本书有什么文学史线索之外的结构的话，那就是从立足于新诗开始，而以反思这种立足点为收束的潜在结构。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天狗》：狂躁又科学的“身体”想象	1
《天狗》与《女神》的时代精神	1
解剖室与人格的养成	5
狂躁而又科学的“身体”	7
第二章 《雨巷》：古典的感伤，还是现代性的游荡？	14
古代性视域里的分歧	14
新感觉派的共同感	16
两种“现代”观与现代性	22
波德莱尔的影响	25
现代性的欲望生产机制	27
第三章 《白螺壳》：卞之琳多思的“宿泪”	32
写作背景	33
“我”的“惊叹”	34
“我”的感悟	35
“白螺壳”的自嘲	37

多思的“宿泪”	38
“智性”的维度	42
第四章《古城》：“边城”荒野的孤独少年行	47
何其芳的《古城》	47
北平诗人的“古城”	51
“古城”中的何其芳及其他	55
第五章 穆旦《诗八首》细读	60
第一首	60
第二首	62
第三首	63
第四首	66
第五首	67
第六首	69
第七首	71
第八首	72
文本背后的文化关联	74
第六章 《射虎者及其家族》的“未完成性”	78
版本流变	78
基本内容与修改的焦点	81
力扬的“自然”叙事空间	92
试探“另一种写法”	100
第七章 《和平的最强音》：从现实需求到历史普遍性	106
石方禹和红色诗歌的阐释问题	106
“和平”作为普遍的正义	108
定义普遍性：作为文化权力的“和平”	114
小结	118
第八章 牛汉：为什么要《悼念一棵枫树》？	119
一首“透明”的诗？	119
“这首诗”的结构与节奏	120

人的复活·····	124
自然之死的生命意蕴·····	126
第九章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温暖与绝望·····	133
温暖的诗，还是绝望的诗？·····	133
一个告别的仪式·····	136
告别中的希望和再生·····	141
第十章 《乡村茶馆》的“现实”与词语建筑学·····	144
“女性诗歌”的得与失·····	144
作为参照的《静安庄》·····	145
“建筑”与栖居·····	148
写诗，或者说建筑生活的乐园·····	153
“看见”，或曰超越事物本身的美·····	157
分叉的时间及其个人呈现·····	167
第十一章 《菠菜》的日常生活政治·····	173
“菠菜”的位置与指向·····	173
重构诗歌与现实的联系·····	178
第十二章 《镜中》：从“传统”之镜中眺望自身·····	183
张枣的“传统”观·····	183
《镜中》诗意空间的生成·····	185
“元诗”意识与“传统”之镜·····	191
第十三章 “《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	195
“对语言本体的沉浸”及其问题·····	195
语言的解禁与幽闭·····	198
隐秘的对话·····	201
“元诗”的现实与魔幻·····	203
后记·····	207

《天狗》：狂躁又科学的“身体”想象

《天狗》与《女神》的时代精神

1919年9月，在日本学医的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第一次读到分行写成的白话诗——康白情的《送慕韩往巴黎》，不觉暗暗地惊异，并产生了投稿的念头。随后，他的新诗投至《学灯》，得到编辑宗白华的认可和鼓励，结果一发不可收，作品源源不断地发表，以激昂扬厉的风格震撼了当时的新诗坛。1921年8月，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作为胡适《尝试集》之后第二部重要的新诗出品，其诗艺在当时不少读者看来已远超后者，甚至被看成是新诗成立的真正起点。1923年，闻一多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女神〉之时代精神》，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所谓“二十世纪底时代精神”是什么呢？闻一多进而从“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科学底成分”“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挣扎抖擞底动作”几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①与一般论者不同，在闻一多看来，“新诗”之所以为“新”，并不在于白话的语言和自由的形式，而是在于内涵的“时代精神”。换言之，新诗成立的依据，从“诗体大解放”转向某种感受、经验的现代性层面。他的说法代表了论述新诗合法性的一种崭新逻辑。

^①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

《女神》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作，像《凤凰涅槃》《炉中煤》《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夜步十里松原》等。写于1920年1月的《天狗》是其中极为重要、极有特点的一首：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底光，
我是日底光，
我是一切星球底光，
我是X光线底光，
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早期新诗的产生，面对古典诗歌规范的强大压力，分行书写的白话诗是否应该押韵，是否应该具有传统的诗美，是否应该传递一种典雅含蓄的诗意等，在当时引发了重重争议。这首《天狗》却完全不顾及任何既定的诗歌规范，以同一个句式的反复重叠，贯穿全篇，充分体现了“诗体大解放”之后无拘无束的活力。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首诗过于粗放、简单，简直是写“飞”了。“我的我要爆了”一类自我想象，似乎也过于夸张。

但要理解这首新诗史上的名作，有必要搁置先在的判断，进入历史情境之中，先做一点“同情的了解”，因为郭沫若诗歌的影响力与“五四”时期特定的阅读心理息息相关。温儒敏曾以《天狗》为例，提出可采用“三步阅读法”来读这首诗。^①

所谓“三步阅读法”，包括“直观感受”“设身处地”“名理分析”。文学史的专业读法往往偏重于“名理分析”，非专业的阅读则多停留于“直观感受”，一般都不大注意还原具体的历史氛围，对于《天狗》这样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作品来说，“专业”或“非专业”的阅读，都可能会有隔膜。那么，依照“三步阅读法”，我们该怎样读《天狗》呢？

第一步是“直观感受”。读这首诗，第一印象可能是狂躁、焦灼，拥有“全宇宙 Energy 底总量”的“我”奔跑、狂叫乃至自我爆裂，反复旋转、连续不断的句式，让人喘不过气来，形成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力。对于阅读而言，这第一印象非常珍贵，但毕竟还是感性的、直观的，如果对“五四”时代的历史氛围完全不了解，得到的印象也只是狂乱烦躁而已。所以，下面可以转入第二步“设身处地”，尽可能将“第一印象”与你想象和理解的“历史现场”结合起来。我们知道，“五四”是一个“个人发现”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假设你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新青年”，觉得面前有无穷的可能性，似乎整个世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加以改造，但又不知如何入手，找不到发挥自我潜能的机会，在茫然无措、焦灼暴躁中，自然会与诗中峻急的节奏、情绪产生共鸣。因而，与其说《天狗》是一种高级的文学，毋宁说类似于一种情绪的通道，用个不准确的类比，“五四”时代的读者与这首诗的遭遇就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突然听到震耳欲聋的摇滚乐一般。这样，阅读的“第

① 关于“三步阅读法”的阐述，参见温儒敏：《关于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载温儒敏、赵祖谟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27-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一印象”就落实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接下来可以进行第三步“名理分析”了,思考直接的阅读感受与这首诗的形象、节奏、情绪有什么关系,进而分析《天狗》中火山爆发一样的情感强度,如何代表了“五四”青年的普遍心态。

当然,“三步阅读法”不必机械遵循,在实际阅读中可以贯通进行,只是为了在读者与作品的互动中形成一种具有历史带入感的“阅读场”,以摆脱那种寻章摘句式的主题归纳和形式分析的套路。这里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依照“三步阅读法”,特别是其中第二步“设身处地”,面对这首诗,你还会有什么其他感受,还会有另外的解读线索吗?“五四”时期,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初立的新诗是非常新鲜、陌生的,即如这首《天狗》,抛开肆无忌惮的狂放形式、“大写”的自我解放主题,当时的读者不仅感觉到强烈的冲击,而且也可能不大能够读懂,特别是诗中夹杂了不少科学词汇、英文词汇,如“X光”“Energy”“电气”,至于“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脊髓上飞跑”“脑筋上飞跑”,如果缺乏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甚至是解剖学知识,当时的读者肯定会感觉莫名其妙。

作为一个评论者,闻一多目光如炬,在讨论《女神》之“时代精神”时,就特别提出了郭沫若诗中“科学”的成分和想象,这也是他不同于早期白话诗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你去,去寻那与我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女神·序诗》

否,否。不然!是地球在自转,公转。

——《金字塔》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底名花!
近代文明底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
二十世纪底亚坡罗!
你也改乘了摩托车么?
我想做个你的运转手,你肯雇我么?

——《日出》

上面引述的几个诗节中，热力学、天文学的词汇，以及以现代工业、交通做比喻，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摩登”与幻想色彩，为读者打开一个崭新的经验世界。而下面的句子更具冲击性：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夜步十里松原》

破！破！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梅花树下醉歌》

战栗的神经、破裂的声带、裸露的脊椎、飞进的脑筋，这些令人惊悚的身体意象也不断出现，怪不得闻一多会点出《女神》的作者“本是一位医学专家”，那些“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 doctor 底口吻了”^①。事实也的确如此。

解剖室与人格的养成

1918年秋冬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求学的郭沫若迎来了两个学期的解剖课。这门课“一个礼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天。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在约略四个月的期间要把这全身的两项系统解剖完”。在自传《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曾非常细致地描述了当时上课的场景，包括尸体腐化后钻出蛆蛹的状态：

这样叙述着好像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像在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在这样奇怪的

^①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